

# 孙中山先生对辛亥革命的伟大贡献

姚薇元 萧致治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领导辛亥革命是他早期的光辉业绩。在以往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一般认为辛亥革命是孙中山等人发动和领导的,但也存在各种不同意见:有的过分夸大个人作用,如说辛亥革命是“由孙文一人领导而起”,<sup>①</sup>或者说“是极少数的热衷于西方思想的人做出来的事,和人民群众没有任何关连”;<sup>②</sup>也有的夸大群众的自发斗争,如说“革命纯粹是一种自发的行动”,和孙中山等人的领导没有多大关系;<sup>③</sup>还有的既否定个人、也否定群众的作用,鼓吹“自行灭亡论”,说清朝的灭亡“是因为清朝的帝制本身已经腐朽不堪,而实质上早已自行灭亡了。”<sup>④</sup>最近,国外又有人过分夸大立宪派和绅士的作用,提出辛亥革命的成功,谘议局的士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孙中山等人的作用并不大。以上种种说法表明,如何正确评价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及作用,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龙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革命没有领袖不行,同样,没有群众也休想成功。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正如头和翼的关系。只有领袖和群众结合,才能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辛亥革命的胜利,正是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民斗争的结果。上述种种论调都带有片面性的缺点,我们评述辛亥革命,既不能忽视广大群众,也要恰如其分肯定孙中山等领导人的贡献。只要结合当时实际,把问题提到当时的历史范围之内,实事求是地评价,那么,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一系列贡献,无论如何是不容否认的。

## 一、提出革命的理论 and 纲领,为革命指明了明确的政治方向

革命的理论 and 纲领,是革命行动的指南。“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sup>⑤</sup>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一般说来,革命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发生的,但革命必须有适应这种经济发展需要的理论和纲领作指导,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辛亥革命时期,提出革命理论,制定革命纲领的不是别人,正是孙中山先生。

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宣誓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中国破天荒第一次提出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合众政府的主张。到了1903—1905年间,孙中山多次提出以实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宗旨。1905年同盟会成立,他又建议以这十六个字作为同盟会的宗旨,并在《同盟会宣言》中作了具体解释。同年冬,在民报发刊词中进一步把它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一年以后,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会上,孙中山作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的演说,对三民主义再一次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完整理论体系。在当时来说,这是中国最高水平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也是孙中山前期革命思想的结晶,为革命指出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列宁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认

为是“带有建立共和国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sup>⑥</sup>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条件下产生的。作为一个革命理论体系，有一个长期酝酿和发展过程。最早萌芽的是以推翻满洲贵族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为宗旨的民族思想；其次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影响下产生的民权思想；最后是鉴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后贫富分化、阶级矛盾尖锐，为防止二次革命而提出的民生主义思想。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民权主义是核心，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族主义是前提，因为只有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争得民族独立，才有民权可言；民生主义则是民权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孙中山认为这是他结合中国情况和时代特点的独创。表明后进的中国资产阶级力图接受西方先进资产阶级建国后的教训，防患于未然，不致在建国后不久就要发生社会革命。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般认为是借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忽视它形成的内部因素，即中国本身的社会历史条件。民族主义与历史上的夷夏之辨和二百多年来的农民反清思想是有区别的，但也有渊源关系。孙中山曾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实行民族主义。孙中山为了替民权主义寻找历史的和理论的依据，既汲取了农民革命战争的经验，也从古代“天下为公”，“民贵君轻”等思想中找到根据（尽管是形式上的附会）。至于民生主义，与孙中山幼时的境遇和中国社会贫困有更密切的关系。他曾对宫崎寅藏说：“幼年的境遇刺激着我，使我感到在实际上和学理上探讨这个问题很有必要”。<sup>⑦</sup>民生主义与太平天国的圣库（公库）制度也有渊源关系。而当时民穷财尽，社会矛盾尖锐，则是他提出民生主义的现实基础。总之，没有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中国的社会现实，三民主义就不能产生和发展。因此，三民主义虽是孙中山学习西方的结果，还必须看到它是产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其本身的特点。这是因为一种思想的产生，总是不能脱离它的社会基础的。没有社会本身发展的需要，不反映人民的迫切愿望，即使再好的理论也不会为人们所接受。

提出三民主义“使中国国民得一种新见解，新信仰，孙氏实有大功，为他人所弗及”。<sup>⑧</sup>三民主义在当时是一面鲜明的革命旗帜。由于当时的清政府是一个卖国政府，又是一个极端腐败的政府，孙中山提出要推翻这样一个反动政权，正符合全国广大人民的愿望，反映了国内各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得到群众的广泛拥护与支持。辛亥革命的胜利，就是在这个革命理论和纲领的指导下，经过许多爱国志士和革命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牺牲宝贵的生命换来的。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孙中山提出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理论，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首先是当时帝制思想流毒很深。中国推行君主专制统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尤其是宋明以后，维护君主专制的理学盛行，尊君思想把人们束缚得无法动弹。姑且不说篡权夺位，即使违背一点皇帝旨意，也被认为大逆不道。如果说，宋以前几乎每代都发生过大臣篡位的事；那末，宋以后近千年间，这类情况就很少见了。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曾国藩手握大权，有人劝他做皇帝，他“不敢”；<sup>⑨</sup>义和团运动期间，那拉氏成了丧家之犬，英国企图支持李鸿章在两广搞“独立”，李也不敢。这就表明了“君臣之分”的封建伦理思想，何等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另外，从农民起义来说，虽然从陈胜吴广起，历代农民起义都曾为推翻旧王朝统治而英勇奋斗，可是他们却始终没有突破皇权思想。即使已经建立资本主义统治的西方各国，

也只美法等少数国家实行共和制。和孙中山同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不但反对民主共和，而且拼命鼓吹君主立宪以维护君主专制；即使改良派中最激进的谭嗣同，大声疾呼冲决封建网罗，也没敢说要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唯独孙中山，早在1894年就提出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合众政府，而且为之终身奋斗。自从民主共和思想广泛传播，君主制再也没有市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张勋妄想复辟帝制，都碰得头破血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没有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理论，就不会有中华民国的成立。孙中山这种创制之功，是永垂不朽的！

## 二、建立革命政党，为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组织保证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党作为革命核心，团结广大群众进行斗争，革命就不可能胜利。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同盟会，就是当时的革命党。这个党的创立者不是别人，还是孙中山先生。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是通过中国同盟会行进行的。

为了团结群众进行斗争，孙中山从立志革命起，就注意组织革命党。早在1893年冬，他在广州抗风轩与陆皓东、郑士良等八人聚会，就酝酿建立革命组织，以“驱逐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1894年，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孙中山为挽救民族危亡，在檀香山联络爱国华侨，于是年11月24日成立兴中会，正式举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旗帜。第二年初，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以后孙中山到处奔波，在横滨、台湾、河内、旧金山相继成立了分会。

兴中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在中国，这是“为以革命主义立党之始。”<sup>⑩</sup>它和华兴会等革命小团体比较，差不多要早十来年。当时改良维新运动正在兴起，许多爱国知识分子聚集在康、梁的维新旗帜下，指望通过清政府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孙中山独树一帜，毅然举起反清革命、建立合众政府的旗帜，确是“倡革命于举世不言之中，争此不绝如发之真气，深足为吾国民之先导。”<sup>⑪</sup>

继兴中会成立后，到二十世纪初，随着维新运动的破产，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民族危机的加深，促进了民族的新觉醒。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纷纷建立爱国革命团体，出版报刊，宣传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统一革命力量，有计划地开展革命斗争。孙中山过去只在华侨和会党中活动，现在看到知识分子倾向革命，唤起了新的希望，对留学生的爱国活动表示积极支持。1903年，在东京创办青山军事学校，正式吸收留学生加入革命组织，同时嘱咐廖仲凯等注意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1904年冬，他应比利时留学生之邀到达欧洲，相继在比、德、法等国留学生中建立革命团体。1905年夏，孙中山再到日本，和华兴会领袖黄兴见面后，即“商组革命大同盟事”，<sup>⑫</sup>接着和宋教仁、陈天华会晤，指出：“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sup>⑬</sup>在成立同盟会的筹备会上，孙中山又强调全国各地的革命组织应结成新团体，同心协力，推动革命进行。孙中山的倡议，得到黄兴等人的支持，集中全国革命力量的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在东京正式成立了，除甘肃一省无留日学生外，其余十七省均有人加盟。由于孙中山的积极努力，终于使小群合成大群，使分散力量结合起来，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

同盟会成立后，各省分派会员潜回内地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分会；孙中山继续为革命到处奔波。1905—1910年间，他多次环游全球，每到一地即演说革命真理，发动华侨加入同盟会。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以他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努力，革命力量迅猛发展，“入会之人，日以百计，”<sup>④</sup>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同盟会的分支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国内各省的革命活动空前活跃。南洋是华侨聚居最多的地方，“凡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员之足迹。”<sup>⑤</sup>美洲过去是保皇党最猖獗的地区，经过他三次游美，美国、加拿大及其他各地华侨纷纷加入同盟会，各地陆续建立分会达数十处。<sup>⑥</sup>其他欧洲、澳洲莫不有同盟会组织的建立。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了新阶段。同盟会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有按照三权分立原则建立起的比较完整的组织系统，有为广大会员和革命人民拥戴的领袖，这是与以前秘密会党显著不同的特点。由于有同盟会的领导，会员分布全国各地，革命斗争广泛开展起来。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纷纷独立，而又很快联合起来，避免了秦末、元末割据称雄的局面。这种情况在农民战争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是建立了统一的革命政党的结果。只有建立了同盟会这样的资产阶级政党，使全国革命有了中心，把学界、工商界、工人、军队士兵和会党组织在同一主义之下，各省革命斗争才能胜利开展；只有有了全国统一的政党领导，才能在胜利后把独立各省很快联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同盟会在全国各地长期进行活动，积蓄革命力量，没有同盟会的积极策划，就不会有一省发动、各省响应的迅速胜利。同盟会是全国胜利的组织者。孙中山等人创建了中国同盟会，为革命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 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为夺取革命胜利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为了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孙中山在创立革命理论、组织革命政党的同时，还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当孙中山倡言革命的时候，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是件十分艰苦的工作。他开初鼓吹革命，不被当作“大逆不道”，就以为是“中风病狂”；<sup>⑦</sup>群众听说要革命造反，害怕破家灭族，“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惊走”。<sup>⑧</sup>孙中山当时孑然一身，既无地位，又无金钱，单凭满腔爱国热情，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显然是无比困难的。但是坚毅的孙中山，为了救国救民，没有向困难低头。他每到一地，或停数日，或停数十日，“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sup>⑨</sup>经过他持久不懈的劝说，激起了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终于逐步打开了局面。兴中会时期，发展会员近五百人，有些人（包括他的哥哥孙眉）甚至倾家相助，支援革命。同盟会时期，“人心倾向革命，如水就下，即平时最喜谈革命者，至今亦连声诺诺，以革命事业为救国之唯一上策。”<sup>⑩</sup>

发动群众革命，不但遭到封建习惯势力的重重阻挠，而且受到保皇派的严重破坏。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曾和保皇派进行了一场争夺群众的激烈斗争。戊戌维新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相继逃亡日本。开初，孙中山对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认识不清，推诚相与，希望联合革命，结果反被他们挖了革命的墙脚。国内长江流域的会党，受了康有为的欺骗收买，转入保皇派怀抱。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源地，梁启超经孙中山亲笔介绍去檀后，在檀大耍花招，兴中会员多半被骗加入保皇会。美洲兴中会因保皇会猖獗而“销灭于无形”。<sup>⑪</sup>横滨兴中会员也“泰半加入”保皇会。<sup>⑫</sup>经孙中山千辛万苦发动起来的群众，几乎全被康、梁夺去。当时正值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之后，史坚如死难，郑士良、杨衢云相继不幸去世。孙中山受到这一沉

重打击，展望未来，“黑暗无似，希望几绝。”<sup>②</sup>可是，忠诚爱国的孙中山没有在邪恶势力面前屈服。为了反击保皇派，他于1903年再赴檀香山，游行各埠，演说革命真理，批判保皇派的反动谬论，揭露他们的欺骗伎俩，划清革命和保皇的界限。曾经受骗的华侨纷纷觉悟，登报声明与保皇会脱离关系。孙中山在檀香山重新建立了“中华革命军”，加入者达数百人。美洲各地华侨加入洪门者占十之八九。孙中山为了把他们从保皇派的影响下解脱出来，亲自加入洪门，并赴美改组致公堂，手订致公堂新章，力图把会党改造为革命组织。

同盟会成立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以民报为主要阵地，和保皇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宣扬革命的正义性与必要性，痛击保皇派鼓吹的君主立宪谬论。影响所及，“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旁薄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sup>③</sup>对保皇派斗争的胜利，促使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是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的一场生死搏斗。武装斗争是斗争的最高形式。敢不敢坚持武装斗争，是决定胜败的关键。孙中山在领导革命过程中，始终把武装斗争放在主要地位。他是最先发动武装起义的旗手，又是败而不馁的悍将。兴中会创立的第二年，他就发动了广州起义，吹响了武装推翻清朝、建立合众政府的进军号。1900年，他乘义和团起义北方之机，又策划了惠州起义。同盟会成立后，1907—1908年间，他亲自组织了六次起义。其中镇南关之役，还亲临前线，点放大炮，为伤员裹伤，革命士兵深受鼓舞。1910年，又在广州发动了新军起义。这些起义相继失败之后，不少革命党人灰心丧气。孙中山满怀革命热情激励他们：“一败何足馁，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sup>④</sup>在孙中山的鼓励下，大家重新鼓起勇气。经过精心策划，又于1911年4月27日发动了广州黄花岗起义，再一次悲壮地失败了。

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却不断地激励了革命党人，唤起了群众，积累了革命经验，沉重打击了清朝反动统治。正如孙中山后来说的，“不特敌人之为胆落，亦足使天下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矣！”<sup>⑤</sup>特别是黄花岗起义，革命志士“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了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成”。<sup>⑥</sup>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些起义的失败，为后来武昌起义的胜利莫下了基石。

#### 四、忠诚为国，为建立和巩固共和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武昌起义以后，虽然全国有十五省宣布独立，“三分天下有其二”，但这些独立省分大都是看到清廷人心尽去，大势无可挽回，便顺水推舟地倒向革命的，胜利并不巩固。旧的反动势力并未受到致命的打击。特别是袁世凯控制的数万北洋军，对革命军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革命军虽然斗志旺盛，数量不少，但并没有经过认真训练，军饷不足，武器装备又不如敌军。双方力量对比，胜利殊无把握。加之各国虽然宣告中立，实际上却在积极支持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面对这种局势，革命党人要建立和巩固共和制度，仍然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孙中山在为建立和巩固共和制度方面呕心沥血，尽了最大的责任。

首先是致力于外交活动，争取各国的外交支持。武昌起义之日，孙中山正在美国丹佛筹款。他得到起义的胜利消息后，认为自己“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决定先从外交着手，等到取得国际支援之后回国。<sup>⑦</sup>他分析了各国的态度，

认为争取英国最为重要，因而径往纽约转赴伦敦进行外交活动。在纽约逗留期间，曾向美国朝野人士宣传革命宗旨，希望得到他们支持。到伦敦后，曾通过维加炮厂经理道森向英国外交大臣葛雷进行交涉，要求英国停止清廷一切借款，制止日本援助清廷，又以革命政府名义与四国银行团、汇丰银行代表商洽贷款和停止对清政府借款。自伦敦抵巴黎，先后与法国外交部长毕恭和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会晤，要求贷款给中国临时政府，希望法国政府“劝阻盟友俄国不与日本沆瀣一气。”<sup>②</sup>这些活动虽然没有取得具体结果，但却说明他为祖国的新生竭尽了力量。

1912年12月，当孙中山从巴黎回国时，南北和谈正在进行，君主民主的争论尚未解决。他一踏上祖国领土就表示：“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sup>③</sup>不几天，他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在就职宣言中又表示要“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并且在誓词中声明：“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所公认”，即解除临时大总统之职。<sup>④</sup>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为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这对阴谋利用和谈窃夺革命果实的袁世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于是，袁借口唐绍仪签约越权，逼唐辞职，由他直接电商，并唆使段祺瑞等四十余人通电誓死反对共和。孙中山不为所屈，始终坚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基本原则。他视个人名位如敝屣，而在共和原则上却毫不妥协，一再声明：“但求达共和之目的，无所私执”，一旦共和确立，即“退居林泉，长为自由国民”。<sup>⑤</sup>为了结束帝制，建立共和民国，他制订了六路北伐计划，准备用武力以达革命目的；同时尽力争取“用和平收革命之功”。1912年1月22日，临时政府将议和最后解决办法通知袁世凯：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绝对赞成共和，孙中山即行辞职，由参议院选举袁为临时总统。袁世凯得到孙中山让位的确切保证后，立即逼迫清帝溥仪于2月12日宣告退位，同时向南京临时政府声明赞同共和。第二天，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推荐袁世凯以自代。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被举为临时总统后，孙中山为了防止他破坏共和制度，“不惜以死力争”，<sup>⑥</sup>坚持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袁须到南京宣誓就任，并遵守临时约法等三项条件，想借此防止他破坏共和，用心可谓良苦。

为了共和制度的巩固，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虽只三个月，仍然做了大量工作，除主持南北和议外，还颁行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政策、法令：如布告全国，务当消融意见，剔除畛域，“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丕振实业，促进教育”，<sup>⑦</sup>通令行政、司法官署，禁止刑讯体罚；晓令人民剪去辫发，解放缠足，开放但户惰民等，允许一体享有国家社会的一切权利；禁绝贩卖“猪仔”，保护海外华侨等。<sup>⑧</sup>特别是制定和颁布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为巩固共和体制奠定了法律基础。凡此种举措，都体现了涤除封建专制瑕秽，贯彻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精神，对于解除思想束缚，巩固共和制度，意义都很重大。

孙中山开初对袁的面目认识不清，以为他能效忠民国，践履《约法》。但是，袁世凯窃夺革命政权后，很快就背弃了诺言，倒行逆施，“使民国徒有民国之名，而有专制之实。”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心灰意冷，思想消沉；孙中山却继续保持革命精神，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斗争、护法运动，为了维护共和体制，继续不懈地坚持斗争。其志可佳，其精神尤为可贵。

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

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我们回顾一下孙中山先生对辛亥革命的伟大贡献，更感到这个论断无比正确。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纲领是孙中山提出和制订的。为了贯彻这个理论纲领而成立的革命政党是孙中山亲手缔造的。为了实现革命纲领，孙中山艰苦备尝，百折不挠地领导人民和内外反动派进行了持久而顽强的斗争，终于取得了革命胜利。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他不以已经取得的成果为满足，为建立共和体制、推进革命继续进行顽强斗争，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象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一样，孙中山先生在对辛亥革命作出伟大贡献的同时，也有他的缺点。如对帝国主义有严重幻想，在革命纲领中不敢公开举起反帝旗帜；同盟会虽是一个革命党，但组织不严密，对各分会领导不力；他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但早期对改良派认识不清，后期一方面和袁世凯作了原则性斗争，同样对袁也一度认识模糊，致使革命两次遭到重大挫折；他真挚地同情农民，却未能认真去解决农民迫切的土地要求。所有这些，我们只能结合当时历史条件，认真总结，把它作为历史教训来吸取，不可苛求于前人。

总之，孙中山先生是真诚的爱国者，是为祖国的独立、自由和富强而奋斗终生的战士，是近代中国的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鲁迅赞颂孙中山“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sup>③</sup>鲁迅的评论是入木三分地道出了孙中山先生的历史本来面目。

① (日)和田清：《中国史概论》下卷，第353页。

② (比)Jacques P·Pirenne：《Grands Courants de l'Histoire universelle》Bruxelles，1944—1956，第6卷，第22页。

③ (法)Henri Cordier：《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et de ses relations avec Les pays étrangers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anciens jusqu'à la Chute de la Dynastie Mandchoue》，Paris，1921 第4卷，第284页。

④ (日)矢野仁一：《近代支那论》，第561页。

⑤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

⑥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4页。

⑦ 宫崎滔天：《孙逸仙传》，《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478页，平凡社1971版。

⑧ 北京《东方时报》评论，见《孙中山先生评论集》，广州中国国民书局十四年版。

⑨ 罗尔纲：《一条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广西日报1981年3月2日。

⑩⑪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上海中山书局编：《中山全书》四，第6~8页，1927年版。

⑫ 黄中黄译录：《孙逸仙》，《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一)，第100页。

⑬ 张继：《回忆录》，《张溥泉先生全集》，第235页。

⑭ 《宋教仁日记》，第9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⑮ 端方：《清平满汉畛域密折》，《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四)，第41页。

⑯⑰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下)，第42页；(上)第37页。

⑱⑲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207、15页

⑳㉑㉒㉓㉔ 孙中山：《有志竟成》，《孙中山选集》(上)，第169、170、173、180、183、185页。

㉕ 廖平子：《北美洲各埠欢迎总理筹款事略》，《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12册，第427页。

㉖ 廖平子：《美洲兴中会历史》，同上，第10册，第253页。

㉗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607—608页。

㉘ 孙中山：《黄花岗烈士事略序》，黄季陆编，《总理全集》杂文，第10页。

㉙ 转见《孙中山年谱》第126—128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㉚㉛㉜㉝ 《辛亥革命资料》第3—4、29、426、159、215—216、233、280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㉞ 《陈英士致黄克强书》。

㉟ 鲁迅：《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鲁迅全集》第7卷，第712—713页。